

舊友

這篇有關別林斯基的軼事，不禁使我想起剛剛踏進文學圈的那段日子。祇有上帝知道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對我來說，那是我一生裏既黯淡但又相當重要的一段歲月。

記得第一次與別林斯基相見時，那時的情形以及他的神采，我至今記憶猶然歷歷如繪。我永遠也忘不了過去的朋友，因為我一直在結交新知。

別林斯基是我一生裏所遇到的最熱情的人。赫爾琴就完全不一樣。他是貴族階級的產物，而這種貴族階級，除了俄羅斯之外，恐怕是別的國家所沒有的。赫爾琴並非移居國外之後，才成為移民——不，他天生便是一個移民。這些貴族，一如赫爾琴一樣，雖然大部分並未曾離開過俄羅斯一步，但都是天生的移民。俄羅斯的貴族在經過了一百五十年的生活之後，其根本之根已經腐爛，他們和俄羅斯泥土及俄羅斯真理相繫的最後一條帶子也已經斷裂了。歷史的形像具體地在赫爾琴的身上表現了出來，栩栩如生：我們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已與一般民衆完全斷絕。就此意義而言，這情形可以說是一種歷史類型。

因為與人民割裂的關係，自然地，他們便也失去了上帝。心底騷動的人就成了無神論者，而那些無動於衷者則冷漠如常。他們對俄羅斯人民的情感，只有輕視，然而却又自以為深愛着人民，希望人民一切都是最好的。殊不知他們的愛是十分消極的，他們盡是根據自己心中的概念，拿些不實在的理想人物來替代一般人民，以為俄羅斯人民應該就是這樣子。

在某些提倡改革的代表們心目中，不由自己的以爲理想中的人民，應該就像是一七九三年的巴黎暴民一樣。在那年代裏，這是最具誘惑力的理想百姓。

不用說，赫爾琴後來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這正是貴族子弟的典型——並非因爲有所需要或是有什麼目的，僅僅是「邏輯推演」的結果，以及在家空虛的緣故。他否棄以前社會的一切基礎，否棄家庭，然而他本人似乎是個好父親、好丈夫。他不承認財產的價值，但又處心積慮地經營各種事業，在國外享受經濟獨立的愉快。他策劃革命，鼓動別人參與，但同時却貪愛舒適與家庭的安逸生活。他是一個藝術家，思想家，才氣縱橫的作家，博學多聞，機智過人；滔滔口才，善於表達意見，令人歎服（他說的比寫的還好）。赫爾琴天生具有相當銳利的內省力，這天賦使他能夠將個人極深邃的情感，轉化爲一種自身所追求的具體目標——只是這目標他有時十分崇拜，有時又加以百般嘲弄。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不比尋常的人。但不論他做了什麼——不論他寫下了回憶錄，或是與蒲魯東合辦雜誌；不論他在巴黎克服了障礙（他在回憶錄裏有很喜劇化的描寫）；不論他受苦，或是快樂，或是因懷疑而焦慮；不論他於一八六三年，雖然不信任波蘭人，但爲了討好，仍對俄羅斯革命者發表了他的宣言，而終於醒悟自己被波蘭人所騙，而曉得自己竟使得無數的年輕人慘遭不幸；不論他後來在文章中如何以令人驚異的誠摯，坦白出這些事——無論如何，他的一生，祇是一個 *gentilhomme russe et citoyen du monde*，祇是一個爲他所憎恨但又是他所來自之處，往昔奴役的產物。他所以成爲這樣一個人，不僅因爲他父親是個貴族，更因爲他與他的祖國以及祖國的理想割斷了的結果。

別林斯基——正相反，他一點也不像一個 *gentilhomme*（「上流人」）；噢，不是！（上帝曉得他來自何處！他的父親是一名軍醫。）

實質上，別林斯基並非一個沉思者，但他終生是一個極端熱情的人。我的第一部小說「窮人」，他很喜歡。但大約一年之後，我們兩人爲了一些毫無意義的理由而分手了；在我初識他的那段日子裏，他對我可以說是

掬心相見，直言無諱。他熱切地，躁急而天真地想把他的思想灌輸給我。

別林斯基熱情如焚，使我動心非常。這事我一點也沒有誇張，至少剛認識的最初一個月是如此。我發覺他是一個熱烈的社會主義者，專心貫注於無神論。換句話說，他那難以言喻的洞察力，以及一個觀念對他竟有如此深遠的影響力，對我而言，且有相當的意義。大概在兩年前，國際社會主義者曾拿別林斯基一篇宣言裏的一句直截而意味深長的話，作爲他們的開場白：「最要緊的是，我們是一個無神論的社會。」——這句話一針見血，戳到了問題的根本。別林斯基也正是以這一句話作爲他一生的序曲。

他雖然重視理性、科學與寫實主義的一切，但同時又比任何人都瞭解，科學與寫實主義只能築成一個蟻窠而已，而不能產生使人可以在其中生活的社會之「和諧」。他十分清楚，道德原則是一切的根本。他深信社會主義的新道德基礎，幾乎到了迷惑的地步（然而，直至今日，只是將常理與常識弄得顛倒曲解，令人憎惡而外，什麼也沒顯示出來）。然而，身爲一個社會主義者，他第一步便是破壞基督教。他知道一切必須從無神論起步。他必須廢除宗教，這宗教是爲他所否棄的這個社會的道德基礎之所在。家庭、財產、個人的道德基礎——這一切都是他激烈否棄的。但我發覺到，他也像赫爾琴一樣，也是一個慈父良夫。

無疑地，他自己明白，否定了人的道德責任，便也否定了人的自由；但他却拼死地相信（這點比赫爾琴還盲目，後者到了後來便開始產生懷疑），社會主義不但不會摧毀人的自由，相反地，可以重建起它前所未有的莊嚴，並建立於一塊新的而且堅固無比的礎石上。

然而儘管如此，最大的難題是，基督本身的人格依然在那兒閃爍着與之對抗。身爲一個社會主義者，他必須摧毀基督的教訓，指責它之虛假與無心的慈善，註定將毀滅於現代科學與經濟教條之下。但即使如此，「神——人」至福的形象；其難以企及的德性，其令人驚愕、奇蹟似的美，却永遠也不會湮滅的。別林斯基的情感強烈得難以抑制，雖然碰上了這無法克服的障礙，却无法停止下來，猶如雷南一般，他宣稱基督不過是人類美的——個理想罷了，未來的億萬年裏再也不會出現的一個典型。

「可是你知道，」有天晚上他尖聲叫道（他每逢極度興奮的時候，經常如此），「難道你不明白，當一個社會是如此卑鄙，使人不得不作惡犯罪時，是不能責怪於人，讓他負荷着無盡的罪；簡單一點的說，當人被逼入罪行時，向人索求即使他想做也無力去做的事，不但愚蠢而且殘忍……？」

那天晚上並非祇有我們倆人，還有一位是別林斯基的朋友。別林斯基非常尊敬他，很多事都是聽從他的。另一位是作家，年紀很輕，後來在文壇上聲譽頗著。

「我甚至看着他也覺得感動，」別林斯基突然中止了狂怒般的感嘆，轉向他的朋友，指着我說。「每次我提到基督，他的臉色立刻轉變，好似隨時就要哭泣一般……然而相信我，善良純潔的人，」他又向我跳來，「相信我，你的基督，如果祂生在我們這時代裏，一定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平常人；面對着現代的科學以及現代的人類推進器，祂一定要被抹殺無疑！」

「噢，不！」別林斯基的朋友插了進來。（我記得當時大家都坐着，只有他來回地踱步）「噢，不！如果基督生在我們的時代裏，祂一定會加入我們的行動，而且帶頭領導……」

「不錯；當然，當然，」別林斯基急忙地承認道。「一點也不錯，祂一定會加入社會主義者的行列，跟着他們走。」

這些所謂的人類推進器——基督被迫冠以此名——指的是那時的幾個法國人：喬治·桑，皮耶·勒洛許（Pierre Leroux），剛剛開始行動的蒲魯東，以及現在已全然被人遺忘的卡貝特（Cabet）。就我記憶所及，別林斯基當時最尊崇這四個人——傅利葉的聲音則早已銳減——一連好幾個晚上，我們澈夜談論着他們。

以前，還有一位德國人也很受到別林斯基的敬重，他的名字叫佛萊巴奇（Fleisbach）。別林斯基的一生裏，從來沒有好好學會一種外國語，他把佛萊巴奇叫做費爾巴奇。至於提到斯特勞斯，別林斯基則面露敬畏之色。

別林斯基對自己的理念如此熱烈地信仰着，可以說是全人類最快樂的人了。後來據說，如果別林斯基活得

更久一點，他一定會加入親斯拉夫學說的。但也或許會移居國外終其一生——如果他活得更久些，而且能够出去的話。假若如此，現在，他，一個瘦小、狂喜自得的老頭子，必然帶着他原來熱烈的信仰，煞有介意地終日彳亍於日耳曼或瑞士人的習俗中，不然就是充當譬如德國赫格夫人這類人物的助手，瑣瑣屑屑地搞些婦女問題罷了。

然而即使如此，這位天賦予一顆平靜安祥的良心，最有福的人，偶然也會有悲哀的時候；只是這份憂鬱却是與衆不同的——不是因為疑懼，也不是因為夢醒之故——噢，都不是——而是來自質問的結果：啊，爲什麼，不是今天，而是明日？——別林斯基是全俄羅斯最匆忙的人。有一次，大概下午三點鐘的時候，我在芝那敏斯基教堂附近遇上了他。他對我說，他已經在外面逛了一陣子，正要回家去。

「我常常跑到這兒，看看工程進行的情況（他指的是尼古拉夫斯基鐵路終站的建築，那時候正在施工之中）。當我站在這裏，一旁觀看工地，心底便覺平靜許多：總算我們也有一條自己的鐵路了。你大概不會相信，這件事對我有多大的安慰。」

別林斯基說話從來沒有像這樣的坦然與誠摯。我們一塊兒走着。途中，我記得他對我說了一句話：

「有天，當他們要將我葬入土裏的時候（當時他知道自已得了肺病），而也只有在那時候他們才會明白，他們失去了一個怎樣的人。」

在他活着的最後一年裏，我一直沒有去看過他。他雖不喜歡我，我却一直記取他對我的教訓，深情難忘。一年之後，我們聚集在托伯斯克（Tobolsk）一座監獄的大院裏，等候即將來臨的命運，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正努力說請總監管安排她們和我們見面。我們看見了這些偉大的受難者，她們不畏艱苦自願跟隨丈夫流配西伯利亞。她們放棄了一切，放棄了地位，也放棄了財富與親屬朋友；她們爲了崇高的道德責任，世上最自由的責任，犧牲了一切。十二月黨人的妻子本身並無罪，但她們願意陪着有罪的丈夫，在西伯利亞渡過二十五年漫長的囚犯生活。

一小時的會面時間終於到了。她們紛紛向我們這羣即將起程赴往另一種不同生活的人說着祝福的話；她們對我們劃十字，將新約塞給我們——這是獄中唯一允許閱讀的書籍。在我服勞役的四年苦刑期間，它一直伴在我身邊，我把它壓在枕頭下。有時候我唸給自己聽，有時候唸給——別人聽。我就是拿着它教導一個犯人識字的。

圍繞在我身邊的這些人，根據別林斯基的信仰來說，他們是情不自禁地犯了罪，比起其他人要不幸一點。我知道，全俄羅斯人都稱我們為「受難者」；許多次我聽過很多人說過這個字。但是這裏的意義稍有不同，而完全與別林斯基常用的不一樣，它出現在我們陪審員的判決裏。這些人的判決裏的「受難者」，聽起來意義與一般不一樣。被迫服四年苦役是一段漫長的教訓；我有時間來說服自己……而這正是我此刻所要討論的。

（註一）別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 1811-1848），十九世紀俄羅斯大批評家與思想家，決定了整個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創作與批評的方向。

（註二）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 1812-70），十九世紀俄羅斯作家。

本刊34期紀弦自選詩集廣告，
刪撥號碼應為三六三五號現代詩
社，誤刊為三六五，特此訂正。